

封 闭 与 融 合

——比较纽约和洛杉矶华人社会的政治参与度

周 权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美国华人最近几年在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 不论是参加竞选还是公民投票, 都取得了很多历史性的突破。与父辈的华人相比, 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参政的萌芽阶段。但是, 纽约和洛杉矶两地华人在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参与方式上有显著差别。通过利用制度分析的方法, 考察移民居住国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对移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从而对纽约和洛杉矶两地华人参政程度不同的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得出结论, 在民主开放的社会背景下, 当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利益动机时, 华人会主动地参与到政治进程中。纽约和洛杉矶两地华人参政的不同是由两地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构架不同所造成的。

关键词: 纽约; 洛杉矶; 华人社会; 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D0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09)04-0043-05

一、问题的提出

华人移民美国从 19 世纪 40 年代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起, 随着 1964 年移民权法案, 1965 年移民与国际法案以及投票权利法案的通过, 华人开始真正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 一个成熟的华人社会逐步形成, 华人的参政意识发生了转变。但是, 在观察表 1 时, 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纽约和洛杉矶这两个华人聚居的城市, 华人的政治参与程度有很大的差别。根据美国官方人口普查显示, 1997 年, 洛杉矶参加市议会选举投票的华人比例是 32%, 而纽约的比例仅为 27%。

另外, 在阅读相关文献中, 也可发现, 纽约和洛杉矶两个城市的华人在融入当地社会政治生活的程度, 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以及参政方式上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在纽约, 唐人街在华人社会中起着重要甚至核心的作用, 而唐人街封闭的状态使纽约华人与当地政治相分离。在洛杉矶, 不仅华人担任市议员和市长的数量占全美华人民众 (市长) 的一半, 而且还出现了与其他少数族裔联合, 建立选举联盟的现象。

根据塞繆尔·P. 亨廷顿的理论, 在分析政治参与水平时, 有必要把两项次维面 (sub-dimensions) 区分开来: (a) 广度, 即从事某种政治参与活动的人的比例; (b) 强度, 即该种参与活动影响政治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 以及它对政治系统的重要性。反映在洛杉矶和纽约的华人政治参与度, 从广度上看, 洛杉矶参加市议会选举投票的华人比例高于纽约。从强度上看, 洛杉矶地区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形成的政治联盟更加稳固, 可以持续地影响当地政治, 争取各自的权益, 对当地的政治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盟本身, 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较高形式, 体现了洛杉矶华人社会参与当地政治更高的成熟度。

那么, 是什么因素导致两个同是华人聚居地的城市却在参与地方政治中产生上述的差别? 进一步说, 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 华人才会走出封闭的华人街, 积极地融入政治进程中, 发挥自己的作用?

表 1 华人在洛杉矶和纽约的投票情况

	洛 杉 矶	纽 约
人口比例	40%	28%
注册投票比例	35.5%	38%
投票比例	32%	27%
家庭收入	\$37 256	\$21 345

New York City Voter Assistance Commission; Los Angeles Times Survey <http://www.census.gov>

收稿日期: 2009-05-26

作者简介: 周权 (1987-),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二、研究方法

1 概念界定

(1) 政治参与度

由于华人的人口结构,经济实力等因素在美国还不具有优势,所以在美国全国性的投票选举中,华裔投票率居全美各族裔之末。2000 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白人的公民投票率是 62%,黑人 57%,亚裔 43%,而占亚裔人口最多的华裔投票率则更低,据估计不到 30%^[1]。但是华人在参与美国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公职和市议会(city council)议员竞选方面非常地积极,表现突出。所以,本文把竞选市议会议员和地方政府公职作为衡量华人在美国政治参与度的重要标准。

(2) 华人社会

华人社会中由于种种的历史和文化等原因,内部存在很多的分歧,但是,华人整体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影响力是以集体行动力为依据的,个人的成功不会对华人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本文主要是把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2 研究视角

西方学者对移民参政问题的研究一般包括以下三个视角:移民的文化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移民居住国的制度^{[2]23-30}。

移民的文化特征,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假定华人的身份是解释他们在政治进程中所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很多学者认为,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华人并不习惯于美国式的民主选举,并且更注重商业领域的发展而忽视政治领域中的作用。但是,文化特征不能解释相同人群在不同地方的政治参与度不同的现象。如表 1 所显示,洛杉矶和纽约同是华人聚居地,却呈现出不同的投票比率,而且两者在参与政治的方式上也非常的不同。对此,移民的文化特征就失去了其解释力。

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把移民集团的社会经济地位看做是决定移民集团在政治领域中参与和影响的独立变量。然而,在美国社会存在这样一种模式,华人在经济上拥有显著成功,但是在政治上却无影响力。一些美国媒体把

华人作为模范的移民,称赞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战胜了歧视,在教育 and 经济领域取得了成就,圆了美国梦^[3]。按照社会阶级分析法来看,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华人在政治上也应该获得相应的地位。但是事实上,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华人,在政治上却显得颇为被动。由此可见,社会阶级分析法也在解释华人在美国参政的问题上失去了效力。

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方法强调移民居住国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对移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制约移民参政的制度因素,首先是移民居住国的正式约束,主要是移民居住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包括移民政策、公民权法、选区的划分以及行政管理实践等。其次,移民居住国错综复杂的非正式约束是广泛影响移民参与的另一种重要的制度因素。最后,移民社团组合及其政治精英对参政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因。

本文的假设是,在民主开放的政治背景下,当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利益动机时,华人就会主动地参与到政治进程中。也就是说,当华人预期能够通过政治参与,比其他途径更有效地扩大自己的经济、财产、教育等权利时,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当地的政治当中。从理论上说,就是个人和群体能否获得用以达到他们目标的各种替换手段,这将左右个人和群体试图影响政府的倾向。假如非政治手段如同政治渠道一样有希望或比政治渠道更有希望,人们就会适当地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非政治手段上。当政治渠道是更有力的解决方式时,影响政府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或显而易见的手段。本文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追溯纽约与洛杉矶华人参政的进程,从而解释前文所提的现象。

三、纽约——封闭的唐人街

由于文化传统因素,海外华人多以种族聚居形式存在,形成很多唐人街,美国也不例外。随着华人与当地人的融合,许多唐人街已经失去了华人聚居地的功能,但是纽约唐人街依然保持其较为封闭的状态,仍在华人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核心的作用。从唐人街的组织结构来看,其非政府的自我管理结构是导致华人政治参与度

低的重要原因。

那么,这种华人的自我管理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如图 1 中所显示,传统的华人社会中最小的组织单位是宗族,即由来自中国同一个村子或者亲戚关系的人组成;在宗族以上是会馆,即由说同一种方言的人组成,会馆一般包括中国南方的广东话、客家话等等。此外,“三合会”等秘密会馆、经济组织协会等纷纷建立。但是这些家族、经济等协会间的竞争和差异往往会引起摩擦甚至冲突。为了减少这种摩擦,华人联合慈善协会(Consolidated Chinese Benevolent Association,简称 CCBA)在 19 世纪后期于纽约成立。

在 1882 年美国通过阻止中国人入籍的法令后,CCBA 成为唐人街内部的管理机关。CCBA 在唐人街内部扮演着为移民提供经济帮助、调节冲突、管理内部文化和商业活动的角色。而在其组织章程中强调唐人街事物应在内部解决,不应诉诸美国法庭或地方政府^{[4]34-35}。因此,CCBA 在起到调节作用的同时,也保持了唐人街的内向性,从而导致华人社会与地方政治的互动失去了利益动机。当地政府机关对 CCBA 管理唐人街的认可使这种制度固定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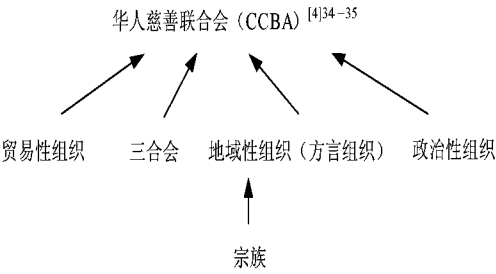


图 1 唐人街内部结构

那么,为什么纽约的唐人街在此之后的进程中也并没有与当地的政治相融合呢?一方面是受到了制度分析法中移民社团组合的性质所影响。如表 2 所示,到 1980 年以前,洛杉矶的新华人移民大都来自于台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拥有很高的学历,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经济基础。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台湾的经济开始繁荣,但是政治上仍是国民党一党执政,缺乏民主。因此,这个时期到美国的台湾移民是希望获得更大的政治自由权。与此相比,到纽约的华人新移民多半来自大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也没

有经济基础,到美国的目的就是寻求一份安定的生活,看重的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因此,当他们到纽约之后,就会迅速的进入唐人街,接受他们的帮助,并适应其内部的自我管理机制。这样,唐人街通过内部自我管理机制,将新来到华人街的华人迅速同化到组织之内,使组织得以长久的运转、维持下去。

表 2 19 世纪 80 年代到纽约和洛杉矶的华人移民来源^{[4]38}

		PRC	TAIWAN
定居比例 (%)	洛杉矶	11	22
	纽约	28	9
移民前的职业 (%)	工人,农民,服务人员	60	15
	教授,管理人员	30	66

另一方面是美国政治制度所起作用,即美国的两党制度。在纽约,华人投票者对于美国两党支持的注册比例是,民主党 48%,共和党 20%,自由选民 29%^{[4]40-41}。因此,无论是哪个党的候选人竞争市长,都很难把这种分散比例的华人社会作为支持自己的力量来动员。而市长对于一个少数民族裔融合入主流社会的作用是很关键的。既然华人社会没有被市长候选人看做是选举争取的必要选区,那么华人的需要和观点也就被其他族裔所取代了。事实上,在唐人街中的华人社会经常感到自己的利益被忽视。比如,在 1998 年,市长考虑到由燃放鞭炮所引起的意外伤害,决定禁止在舞狮和游行队伍中使用烟花和爆竹。几个华人社团联合起来反对该项决议,并提出相应的替代方案。对此,市政厅先是同意在离开游行队伍的固定地点可以燃放炮竹,但是,随后市政厅又宣布由于时间仓促,无法对警局和消防部门作出必要的安排。最后,华人在没有烟花表演的情况下度过了春节^{[4]34-35}。在很多的华人看来,市政厅的决定不是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是他们被政治边缘化的反映。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纽约的华人社会才没有冲出唐人街的范围,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导致了纽约的华裔政治参与度偏低。

四、洛杉矶——华人的融合

尽管洛杉矶的唐人街以前也发挥过内部自

我治理的作用,并且现在仍然存在。但是洛杉矶的华人已经离开封闭的唐人街中心,居住在洛杉矶的各个地方,与当地社会相融合。由此,导致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度与纽约的华人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据不完全统计,在洛杉矶,有华人担任市议员和市长的将近 20 名,占全美华人议员(市长)的一半^{[2]23-30}。那么,洛杉矶的华人是因何走出唐人街,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的?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由于美国放宽了移民政策,加上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香港、台湾两地的居民担心美国失去对大陆进军港台的制约力,所以大量移居美国。正如表 2 所显示的,此时来到洛杉矶的移民多数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出色的职业技能和良好的经济基础,所以,当他们来到美国时,并不需要很多的帮助。这种华人社会内部性质的改变导致他们不愿在拥挤、嘈杂的唐人街落户,而是选择环境良好,比较开放的美国主流社会中定居。据调查,1990 年,在洛杉矶 245 033 的华人中,只有 4% 在传统的唐人街定居。

正是因为洛杉矶的华人不再集中于唐人街,他们也就从纽约唐人街的那种相对族群自治的结构中脱离出来,而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当中。但是,当他们不再服从华人社会内部的自我管理机制时,就要与他们所居住地的利益发生互动,由此,出现了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的动机。

当华人新移民进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时,他们面对的是白人长住民的族裔优势,此时,华人充分地感受到了自己作为少数民族力量的薄弱。为了能够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地位,华人与其他族裔建立联盟,在地方性的选举中,实现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族裔的联合中,华人社会主要是与其他亚裔社会,如日裔,韩裔等结成联盟,最典型的组织就是亚太地区政策计划委员会(AP3CON)。AP3CON 积极整合亚裔社会的各种政治资源,促进亚裔权益。一方面,他们鼓励亚裔积极参加投票,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鼓励自己的族裔候选人出来竞选美国政府公职,并为他们提供选票和竞选资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政治捐款和承诺选票支持,要求当选者委任有能力的亚裔担任一定级别的政府职位,提高亚裔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4]。

此外,华人还与拉美族裔的团体相结盟。因为拉美族裔在美国的少数民族裔中属于人数较多的族裔,所以当与他们相联合时,可以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双方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实现彼此的需求。比如,在对洛杉矶第 59 选区的划分中,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使美籍亚裔的人口比例高达 35% 的同时,拉美族裔和民主党选民超过人口比例的 50%,从而使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4]。

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融合和联盟,华人社会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再只为华人利益服务,而追求的是社区利益或代表更广泛公民的利益。

五、总 结

在纽约,华人的数目很大,本可以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由于封闭的唐人街的社团组织结构模式没有被瓦解,这种内部自我管理机制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使华人社会的内向型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华人社会在这种内部机制中,并没有发现参与当地社会的利益动机,甚至有时觉得自己的政治利益是被边缘化的,所以对于政治地参与热情不高,也由此导致了纽约的华人政治参与度低。

在洛杉矶,虽然传统的唐人街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华人已经不再集中的居住在唐人街,而是分散的定居于城市的各个部分,与当地的主流社会相融合。这样,华人社会中就出现了政治参与的动机。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华人社会开始积极地参与当地的政治,并采取与其他族裔结成联盟的方式,在当地的政治中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这是在上述两个不同的政治参与过程的作用之下,产生了本文开头提出的两地不同的政治现象。

参考文献:

- [1] 陈传仁. 海外华人的力量——移民的历史和现状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89 - 250.
- [2] 朱陆民. 西方关于移民参政的几种理论阐释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 11 (6).

- [3] FREEDMAN A L 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ese overseas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58 - 289.
- [4] KWONG P. Chinatown, NY: Labor and Politics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Isolation or Integr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 Americans in New York and in Los Angeles

ZHOU Q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 or third generation Chinese - Americans are very active in political circle recently. They have made many historical breakthroughs both in election campaigns and citizen - voting. Compared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y are at the early stag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of this Chinese -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New York and in Los Angeles in its extent and in its patterns are obviou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 - depth analysis about this phenomena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institutions,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immigrant inhabitant country's regime and social structure on them to find the reason of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 Americans in New York and in Los Angeles. Finally,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n a democratic and open society, with impetu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ests, Chinese - Americans have great initiation to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political progress. The difference of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Chinese - America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interest - motivation.

Key words: Los Angeles; New York; Society of Chinese - America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责任编辑 王 春]